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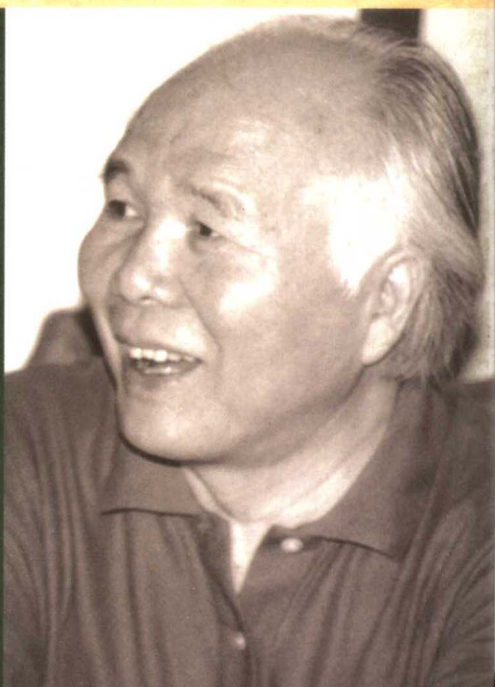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LUXUN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CONGSHU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李国文杂文

李国文 / 著



李国文，小说家，散文随笔作家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主
席团委员，《小说选刊》主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。1930年生于
上海，祖籍江苏盐城。1957年开始文学创作。短篇小说《月食》获得
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长篇小说《冬天里的春天》获得首届茅
盾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花园街五号》因几与时代同步，为1982年十
大畅销书之一，并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。《危楼记事之一》曾获
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中篇小说《涅槃》获得首届鲁迅文学
奖。随笔集《大雅村言》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已出版小说集、杂文集等10余部。

近期著作《莎士比亚传》以及重新评点
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》
和《中国文人的活法》等书，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。
《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》

获得1999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。
至今写作了5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。

李国文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LUXUN WENXUEJANG HUOJANG ZUOJIA CONGSHU

韩作荣 主编

李国文杂文

李国文 /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国文杂文 / 李国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6. 6

(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 / 韩作荣 主编)

ISBN 7-5087-0971-3

I. 李... II. 李... III. 杂文 Ⅳ.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0112 号

丛 书 名: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主 编: 韩作荣

书 名: 李国文杂文

著 者: 李国文

责任编辑: 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 66051698 **传真:** (010) 66051713

邮 购 部: (010) 66060275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48mm × 225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、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总序

陈建功

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大奖之一，每三年评选一次，其评奖项目包括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散文杂文、理论评论和外国文学译介七个门类。该奖项因贯彻了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“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无论是评奖委员的产生还是参评作品的征集与评选，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和监督机制，因此在文学界乃至社会各界，享有很高的威信。获得该奖的作家，有文坛耆宿，也有文场新秀，他们展示了某一时期中国文学某一文体的代表性风貌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，除了获奖作品具有标志性水准外，其他作品也都具有相当的层次，反映了我国当代文学某一体裁创作的较高成就。

中国社会出版社素以出版优秀图书服务城乡社区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，在为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，认为对高雅文学的扶助和推广同样不可或缺。他们这次推出的“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”，首批包括了获奖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杂文随笔集。以这些作家思想的敏锐及对生活独到的感悟和思考，以其个性纷呈艺术老到的表现力，相信读者通过这次高雅文学的巡礼，会得到情感的熏陶、思想的升华和极大的艺术享受。

大众文学和高雅文学，有区别，也有融合。作为读者，兼收并蓄，可以获得丰沛的审美愉悦和享受。丘吉尔、邓小平，皆为

金庸小说的忠实读者，可见热衷于大众文学者并不卑微；有贩夫走卒，也有乔伊斯、普鲁斯特的“粉丝”，可见高雅文学也不全然“雅不可耐”。读大众文学，可开心可解颐可惊悚可温馨，可壮英雄胆扣佳人泪；读高雅文学，可感慨可深思可叹惋可悲愤，可另眼看人生只眼看世界。应该说，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高雅文学，都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，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诚然，大众文学的批判者揭示了“现代文化工业”的“造神”过程，揭露大众文学的虚假化、浅表化、媚俗化及其消费主义的本质。而高雅文学的批判者则讥讽高雅文学“雅不可耐”的尴尬，宣判了它式微的前景和惨淡的未来。窃以为，除了绝对化的断言和展望缺乏理性之外，这些批判和讥讽，对于不同文学的发展或许都是警世名言。但读者既需要娱乐身心的文学，也需要观照人生提升审美的文学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我们的出版社，博采各家，兼容并包，既照顾到读者的娱乐需求，也照顾到读者深化人生体悟提升审美素质的渴望，把类似“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”之类的佳作推出，应该说是深得人心的善举吧。

为此，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充满崇高的敬意。

是为序。

2006年8月16日

注：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

目 录

大雅久不作	/001
“文人无行”	/008
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	/015
诗人啊，诗人！	/023
曹雪芹的苦恼	/031
最怕胡庸医	/039
“升沉不过一秋风”	/049
想像力到哪里去了？	/058
答客问	/068
文人长寿考	/074
头发的功能	/077
眼睛的功能	/085
嘴巴的功能	/093
鼻子的功能	/106
耳朵的功能	/117
舌头的功能	/127
屁股的功能	/136
小人难防	/149
说海瑞	/155
和珅跌倒	/163
唐末食人考	/178

目 录

暹罗双胞胎	/193
西窗漫话	/203
主考认错	/222
李贺与《高轩过》	/225
红杏出墙	/230
“鹅不知耶?”	/233

大雅久不作

打开《全唐诗·李白卷》，第一首，就是这首《古风》。

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？王风委蔓草，战国多荆榛。龙虎多相食，兵戈逮狂秦。正声何微茫，哀怨起骚人。扬马激颓波，开流荡无垠。废兴虽万变，宪章亦已沦。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。群才属休明，乘运共跃鳞。文质相炳焕，众星罗秋旻。我志在删述，垂辉映千春。希圣如有立，绝笔于获麟。”

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：这首《古风》反映了李白的文艺思想云云。

这样说当然也没错，不过，要是有可能与李白先生求教的话，他未必会首肯，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士：具有责任感，负有弘扬雅正之音的使命。虽然在这首诗中，他忧心忡忡地呼吁“大雅”之作的出现，洋溢着“拨乱反正”的精神，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，现在流传下来的九百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，他老人家也并不完全遵循这个准则，更不会始终如一地在身体力行着了。

有人认为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，这是根据他引用孔夫子的话“甚矣，吾衰也”而来。我认为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，往往讳言其老，而李白在六十一岁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，作为一个充军贵州的囚徒，绝不是那么快活的，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文学动态。但这首诗，也不会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。那时，他在长安城里，活得太滋润，太优哉游哉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哪还有心思顾及文学。我认为，这首《古风》，有

可能是他天宝三年（公元744年）离开长安以后，已经很失落，但未很失败的期间写的。

写正统的诗，他未必坚持正统。对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，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，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，无异于精神的奴役。如果我们理解李白，他在人格上，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的话，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。

在文学史上，凡大师，无不处于矛盾和思想冲突之中，李白尤甚。一方面，对于利禄声名、飞黄腾达的企羡之心，对于立功当世、以邀圣宠的非凡之想，强烈得使他几乎不能自己。一方面，又想浪迹天涯，徜徉山水之间，啸歌行游，把酒赋诗，及时行乐，不受羁束。但世界上有几个真正甘于寂寞的文人呢？不过在口头上如此标榜罢了。唐代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，假门假势地要去隐遁，可又不肯走得太远，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。隔三差五，假借回城买方便面的理由，又跑到都城来窥探动静。

作家也好，诗人也好，安分者少，所以，李白也不例外。总是在山林间，不为世知，也不是办法；当苦行僧，没得酒吃，嘴里淡得出水，也很受煎熬；诗写得再好，若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，也是白费功夫。于是诗人急了，早先，他就给荆州刺史韩朝宗上书自荐：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，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，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丈”，“请日试万言，倚马可待”，何“不使白扬眉吐气，激昂青云耶”。渴望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后来，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自抒胸怀，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，抱负之大，就更不得了。

这就是诗人的狂放性格了，太充分的自信，与吹牛相差无几。不过，就算是吹牛吧，你也不能不为这位大诗人吹得那份大气磅礴、地动山摇而服气。反观近来那些口出狂言，以为语惊四座者，相比之下，恐怕只能等于阳痿患者的偶尔勃起的小意思了。

别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业，报效朝廷，“南风一扫胡尘静，西入长安到日边”，但是，他心灵深处那压根儿的反潮流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是他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。最后，他连唐玄宗的文学侍从——供奉翰林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，也干不下去。本来李白一门心思参政议政，以为从此可以大显身手，大展雄图，谁知李隆基却只要他写诗，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哄杨贵妃开心而已。

在帝王眼里，奔走宫廷的御用文人，与华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监一样，不过是侍候人的。被贺知章捧为“谪仙人”的李白，怎么受得了这种“倡优同畜”的待遇，终于打了辞职报告，卷起铺盖，告别长安。也许，他未必真心想走，说不定一步一回头，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，与圣上热烈拥抱呢！我们这位大诗人，在兴庆宫外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到，只好噘着嘴，骑着驴，出春明门，东下洛阳，去看杜甫了。

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，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，在野与在朝，又想吃、又怕烫，要不吃、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，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，不放心，断不了收拾，甚至杀头的原因。

所以，李白这首《大雅久不作》，只能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来看。清人沈德潜编《唐诗别裁》，也将他的这篇作品与他整体创作区别开来。“太白诗纵横驰骤，独古风二卷，不矜才，不使气，原本阮公，风格俊上，伯玉《感遇诗》后，有嗣音矣！”

“矜才使气”，才是诗人李白的创作和为人的风格。我们谈作家，谈作品，一定要区别其复杂性，具体性，多义性，特殊性。采用“一言以蔽之”的方式方法，往往难中鹄的。每一个作家，都是他自己，也就是黑格尔说的“这一个”。作家与作家之间，异同之处，应该要大于相同之处。作家自己的作品与作品之间，也应该如此才好。一个与别人过于相同，与自己过于相同的作家，我敢肯定，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。

但是，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，无论是拼命染黑头发，不甘过

气的名流前辈，还是刚长出小胡子，作深沉状的新锐先锋，无论是用耳熟能详的老语言，还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词，来分析作家与作品时，总是习惯于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的考量方式，对于这类执行“六经注我”政策的先生们，实在令人好不痛苦。

于是，不禁使人想起希腊神话里那个达玛斯忒斯。

这个拦路大盗，可真是厉害，谁要不幸住进他的客栈，比落到《水浒传》里那孟州路上、十字坡旁、母夜叉孙二娘开的人肉包子店里，命运也好不了多少。凡住进他黑店的客人，个头长于铁床者，截短；短于铁床者，抻长。我不知道当下这班评论家和研究者，怎么得到达玛斯忒斯的衣钵真传，以铁床逻辑行事的。反正，在新时期文学中，一些被尊之为“爷”一级的评论家，那种扬之即生、抑之则毙的霸道，恐怕就是达玛斯忒斯铁床的极致表现了。

由于纳入这种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，李白这首对于文学状况的不怎么满意的诗，一下子就有点“高瞻远瞩”的味道了。其实，这首《古风》中写出来的“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。群才属休明，乘运共跃鳞。文质相炳焕，众星罗秋旻”的颂德词句，应该看得出来，诗人一方面借重官方，加大他对于“大雅久不作”的批判力度；一方面也有讨好主流意识的用心在。以求赏识和冀得擢用，一直是李白的致命伤，否则，他不至于站错队，“为君谈笑静胡沙”，去为野心家永王效力，而流放夜郎了。

在这首诗中，只有这两句，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，可称诗胆，也是李白写这首诗的主旨。编《唐诗别裁》的沈德潜，在选用这首诗后，特地加了个注：“昌黎云，‘齐梁及陈隋，众作等蝉噪’。太白则云，‘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’，是从来作豪杰语。”说明他认同这个看法，但是又注了一句：“‘不足珍’谓建安以后也。《谢朓楼饯别》云：‘蓬莱文章建安骨。’一语可证。”他引李白自己的诗，把建安诸子区别在“绮丽不足珍”之外。实际上，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，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韩愈的观点的。

自古以来，在文学领域里，雅正之声和绮丽之音，这两种思潮的抵牾，孰高孰低，孰轻孰重，一直是争议的题目之一。在李白以前的半个世纪，陈子昂那首有名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怅惘；在李白以后的半个世纪，韩愈的“齐梁及陈隋，众作等蝉噪”的否定，都证实了从两晋南北朝，直至隋一统的三百多年间，绮丽之音，愈趋侈靡淫巧，浮艳颓废，致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，丧失生机。正如有些人玩文学，玩到最后，把自己也玩进去一样。看来，李白的“大雅久不作”，“绮丽不足珍”，显然是有感而发。

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，“甚矣，吾衰也”，说自己老了，没有力气写大作品了。但是，他的意思很清楚，文学不能尽是风花雪月，吹拉弹唱，男欢女爱，床上功夫，更需要像《诗经》中《大雅》那类具有史诗性质的鸿篇巨制。要是好久好久没有出现这类严肃的、认真的、深切的、有文学价值的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，是无法向时代交代的。

所以，他在诗中表决心，“我志在删述，垂辉映千春。希圣如有立，绝笔于获麟。”要以孔夫子著述《春秋》的严肃，整理《诗经》的热忱，重塑时代的黄钟大吕。诗人虽是这样表态，但也不妨碍他去写“春风不相识，何时入罗帷”、“玉阶生白露，夜久侵罗袜”等玲珑剔透的小诗。雅正之声不可或缺，绮丽之音不可偏废，这两者，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。

只有周作人，只有沈从文，只有张爱玲等几位顶尖的“红人”，能支撑得住“五四”以来的现代文学吗？这几位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的鼓吹，而成神成圣的作家，在他们笔下的20世纪前半叶，除了精致的绮丽之音，诸如绅士闲适，墨客雅兴；男情女欲，悲欢爱仇；香奁脂腻，帘卷春色；小草小花，青山绿水外，还能给读者什么呢？一部没有了鲁、郭、茅，没有了巴、老、曹的现代文学史，拿在手里，还会有多么重大的分量呢？

在进入21世纪，开始一个新的千禧年的时候，重新读李白这首“大雅久不作”，不知为什么，倒颇有一点耐人思索之处。尤其

在“吾衰竟谁陈”的感慨中，透出诗人对于文学状态那种深深的遗憾，还带有一些无奈，不能不感到一种震动。

历史，有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，文学史也同样，有时会呈环行状态的运动方式，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，又回到始发点。在上一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，公元1000年，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，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，简直令人不胜讶异。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，又重蹈两晋以后的宋齐梁陈隋的覆辙，等于重新拷贝了一回。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”的局面，又一次出现。1000年的中国文坛，不免显得荒芜冷落。说是空空如也，有一点委屈时代；说是不甚好的年景，或许更接近事实。比之两百年前，李白、杜甫的盛唐；比之一百年前，李商隐、李贺的晚唐，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，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了的。但第一个千禧年钟声敲响的那刻，翻开中国文学史，宋之初，可堪称道的作家和作品，屈指可数。

“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。”《宋史》的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。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，以《花间集》为代表的那些旅愁闺怨、合欢离恨、轻狂冶游、燕婉情私，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。北宋初期的诗文，仍受五代影响，没有什么起色，也很正常。文学进入了低潮期，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。确实也是这样，大约过了半个世纪，公元1050年到1100年，便出现以范仲淹、梅尧臣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王安石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。文学的断档，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。

我在想，当代中国文学，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，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，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，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。其中，绮丽之音这部分，似乎也到了淋漓尽致的田地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写、不敢写和不会写的。相比之下，大雅之声这部分，也就是史诗式的不朽之作，还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之中，望眼欲穿。坦率地讲，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，像唐诗、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，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

家和作品，一时间，竟不能屈指数来，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感到汗颜的。

然而，在新人辈出、后来居上、总结经验、开拓未来的年代里，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。因为，宋齐梁陈隋也罢，梁唐晋汉周也罢，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宁、战祸相继的年代，这期间的文学史出现空白、断档、走弯路，是不足为奇的。如今，民族腾飞，国家复兴，那么，与之相称的“盛世文章”、“汉唐景象”，也是自然而然必将到来的事情了。因此，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，真诚期望第二个千禧之年，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。

“文人无行”

鲁迅先生在《集外集拾遗》的《辩“文人无行”》中说：“轻薄，浮躁，酗酒，嫖妓而至于闹事，偷香而至于害人，这是古来之所谓‘文人无行’。”这里所总结的轻浮轻薄、躁狂狷急、醉生梦死、性事糜烂，倒也是被世人物议的无良文人们的典型表现。

“文人无行”，语出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：“观古今文人，类不护细行，鲜能以名节自主。”作家们行为不检、有欠自重、名声败坏、貽人笑柄，在文坛上的这类丑事糗事，确是从来不绝的。曹丕的话里，我们多少还能听出一点宽容之意。但后来的史书记载，对此种现象，颇多诟言，便不那么客气了。也许，古代文人在这方面的表演，要更招人反感些，方才绳诸笔墨，予以针砭的。

当然，如今的作家中，有教养者愈来愈多。所谓无行的文人，总的来说在减少着，应是不争的事实。无论如何，世纪交替，文明进步，发展趋势，历史必然，作家整体素质的提高，那是毋庸置疑的。

因此，时下偶尔出现的，那些一定要往地毯上吐痰，一定要从窗口向外撒尿，一定要从摩天高楼上往下擤鼻涕，一定要随手牵羊从宾馆顺走些什么，一定要吃约稿女编辑的豆腐甚至动手动脚，一定要住星级饭店不然就会失眠，一定要有左拥右抱的三陪才会诗兴大发，一定要麻将打到天亮眼珠通红走出房间的文人，相对于古人的表现来说，是小小不言的无行了。

我们有理由为这种进步而高兴。如果翻一翻宋代端明殿大学士宋祁所修的《新唐书·文艺》，看看他给唐代文人画的像，就会觉得上述边幅不修的诸位哥儿们，和一定要写自己与多个男人滥

交经验的姐儿们，简直是非常好样的了。

宋朝的宋祁绝无存心糟蹋唐朝文人的意思，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《题司空图诗卷末》中得到证明。他说：“噫！表圣，贤者也。以其贤故，一言一物为后人爱秘若此。宁当时之人举不及后人之知表圣耶？是不然，同时者，异时者慕，尚何怪哉！”看出他是个很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学者。

唐代诗人司空图，字表圣，自号休休子，又号耐辱居士。冲其字号，知其自许甚高，故而不甘世俗。原来，他也曾很自负过的，认为有宰辅之才，后因求官不售，便遁迹中条山中，做到了真正的背靠文坛。不像当今一些声称与文学“拜拜”的名家，虽欲隐而难耐寂寞，时不时在小楼上用望远镜东张西望，如同唐代那个叫卢藏用的文人，“往来于少室，终南二山，时人称之为‘假隐’”一样，是一种以隐求显的伪君子，不足为训。

司空图说隐便真隐了，最后召他为礼部尚书都不干。躲在山里，潜心从事诗歌理论研究，一部《二十四诗品》，至今还是诗歌评论界的基础读物。宋祁很尊崇他，所以这几句话写来也很有感情。宋祁所谓“媚”，即嫉妒，表现在文人身上，便是彼此相轻。对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说，“媚”，没有什么稀奇，由于名利、权位、风光以及莫名其妙的欲念而引发的竞争，而产生恨不能将对手生吞活剥的歹毒心理，是可以理解的。见别人写得稍为好些，活得稍为强些，马上嫉妒得眼露杀气，心怀叵测，做出种种张致，甚而下作无耻，都是可能的。但相隔一段时间以后，前人成了故人，故人成了古人，彼此无利害冲突，感情自然是“慕”而不是“媚”。宋祁的分析很有道理，因此，他没有必要说唐人的坏话。

何况宋祁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作家。虽然他的小词写得很是清丽可爱，但他相当谦逊自约，为人赞许。他的《玉楼春》：“东城渐觉风光好，縠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仅点出春天绚丽的这一个“闹”字，其贴切准确

的程度，也足以垂范千古。但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和《治戒》一文中，再三强调其水平“学不名家，文章仅及中人”。他要看到后来一些自封或人封的大师，自称或人称的经典，自以为或人以为的不朽和传世，一定会惊叹这些无良文人那不亚于城墙厚的脸皮，而自惭弗如。鉴古知今，同样，以今解古，宋祁在《新唐书》里描绘唐代文人的笔墨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如：“崔信明，蹇亢以门望自负，尝矜其文，谓过李百药，议者不许……坐怨谤流死。”

崔信明“以门望自负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也就是恃出身好、成分好来压人。这种以非文学手段在文坛拔尖称霸消灭对手的做法，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照方抓药。其实，李百药在唐初文坛，不但资格老，而且著《齐书》五十卷，已有定论。但小文人通常就是这样没起子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，就是不服气比他哪怕出色一点的同行。自负，是文人差不多的共同弱点，一旦无可骄傲还偏要骄傲的话，十之八九会产生歇斯底里。崔信明非要认为自己胜过李百药，而大家不承认，不买账，嗤之以鼻。于是，气极生疯，至少是患了轻微的躁狂性精神病。这样的人，必然要不停地折腾，一直折腾到死为止，最后因怨谤而流死，也是活该了。前几年我们也曾见识过这类人物的，结果又如何呢？最后还不是以成文坛笑柄被人不齿而告终？

如：“李勣戒刘延祐曰：‘子春秋少而有美名，宜稍自抑，无为出人上。’”

看来，刘延祐年轻时，就很出名了。少年有成，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才使得老干部对他进行这番善意的教导。李勣是唐初开国元勋，资望很高，把他惊动出来，可见这位神童作家大概张狂了一点。有才华，即使盖世，也不能像南朝谢灵运那样自诩：“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。”谢灵运最后闹得在广州弃市，焉知不是骄傲的缘故才把脑袋弄掉的？因此，一个年轻作者，写了几篇作品，瞎猫碰死耗子，红了，完全用不着亢奋得睡不着觉。文学是个漫长